从“留学热”到“海归潮”：

海归群体反向文化震荡的心理与行为效应

廖思华[1] 徐迩嘉[1] 丁凤仪[2] 胡平[1] 胡晓檬[1]

（[1]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2]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4）

摘要：海归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返回国内，通常都会面临再适应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反向文化震荡，它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多个范畴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梳理并评述了关于海归群体再适应以及反向文化震荡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且从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剖析了产生这些心理效应与行为后果的内在过程和影响机制，以期为海归的反向文化适应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践启示，进而为政府部门、智库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工作者提供实证支撑和科学参考。

关键词：海归，反向文化震荡，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应对策略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归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回国人员数量较2018年增长11.73%。自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为656.06万人，其中86.28%在毕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海归群体人数众多，回归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留学生留在国外面临的环境和形势复杂多变，这意味着我国或将迎来新一轮的“海归潮”。海归群体通常是指从母国出发前往东道国或其他地区，停留一段时间工作或学习，最后再回到母国长期生活的群体。海归群体普遍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不仅拥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更拥有国际视野，是我国以高校和民营为主的教育行业、专业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化趋势加强所急需的中高端人才。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海归群体作为多元文化的载体，对海归群体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多元文化经历的理解，从而促进跨文化的沟通、理解和合作，以及探索其背后的内涵机制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帮助海归群体良好的适应回国生活和工作环境，避免和解决因反向文化震荡和适应不良产生的负面心理和社会后果，促进海归群体与本土群体友好相处，引导和鼓励留学归国人员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为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提供学术支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2. 反向文化震荡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

反向文化震荡(reverse cultural shock)是指个体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母国(home country)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不适应，包括情绪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和压力（美国国务院，2017）。大量的研究表明，反向文化震荡是回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严重程度与适应策略的选择（Kranz & Goedderz，2020）和文化智商（Presbitero，2016）息息相关。Howard (1974)发现，由于期望差异，海归可能会经历的反向文化震荡包括收入减少、声望和地位的丧失、工作资格的不足和/或过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安置、对国内形势的失望、国内业务的不足以及对同行的怨恨等。Chiang（2011）采访了25位回到台湾的年轻海归。在采访中，他们报告了在某些时刻经历的反向文化震荡。大多数人表示，比起留在台湾，他们更愿意搬回客国继续发展。Alkhalaf（2019）调查了美国留学的沙特阿拉伯的留学生，结果发现，75%的被试都表示在回归母国后经历了一段反向文化震荡，其震荡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呈负相关，与负面情感呈正相关。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反向文化震荡得分更高，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较低。另一方面，Kartoshkina（2015）在研究了美国青少年的海归状态后，发现回归并不只会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带来一种“苦中有甜”（bitter-sweet）的复合情绪，其中包括了与母国的亲友们相聚、与其他海归分享出国经验以及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看待母国文化的视角。Wang（2016）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差异不仅会

带来心理不适以及文化震荡，更能为海归带来一种在职场中身处“两种文化之间（cultural in-betweenness）”的心理优势。

Laframboise 等人（1993）在 Berry 的四种应对策略之上加了第五种应对策略：反复型，即新来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时，可能会反复不定地游荡在任意几种策略之间。Navas 等人（2005）同样参考了 Berry 的模型并增加了五个要点，将其命名为文化扩展模型（RAEM）。首先，研究者参考了 Bourhis 等人（1997）对于双方交互影响的结论，将移民组和本地组的适应策略纳入了计算模型；第二，研究者将移民的种族类型区分开来分别计算；第三，在 Piontkowski 与 Florack（1995）和 Bourhis 等人（1997）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心理变量与行为准则。此标准可以帮助模型更好地评估其预测能力以及可能的影响因子第四，RAEM 将现实与理想区分开来。研究者认为，移民组与本地组喜欢的适应策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们真正选择了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最后，研究者观察了社会文化现实，并记录了可能出现的新的适应策略及态度。在海归心理学领域中，Berry（1990）以及 Navas 等人（2005）结合起来的文化适应模型已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并被引入实践应用领域。

另一方面，Gullahorn 和 Gullahorn（1963）在描述文化适应的 U 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延伸，并将其称之为 W 型模型，即个体回归后所需经历的二次文化冲击。U 型模型（Lysgaard，1955）描述了文化冲击的四个阶段。首先，在愉悦感（euphoria）阶段，个体在到达新的国家时所经历的兴奋及好奇感会让他们在最初的阶段格外的积极。但是，在愉悦感逐渐冷却后，新环境中遇到的消极事物甚至歧视会让个体受到文化震荡。第三阶段为文化适应，即个体逐渐适应新的环境。最后，当个体成功适应新环境后，将会迈入稳定期结束文化震荡的过程。Gullahorn 和 Gullahorn（1963）的 W 型模型则是上述模型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支持 W 型模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其中 Black，Gregersen 和 Mendenhall（1992）指出，并不是所有海归都会经历反向文化震荡的 W 型模型中的愉悦感阶段，其中高达 70%的受访者对回归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也有学者认为，在心理层面上，回归过程会比出国的过程更加艰难，所以不能一概而论。Furukawa（1997）表示，海归们再回归后的 6 个月中可能表现出极大的情绪困扰，甚至可以达到临床诊断标准。Sussman（2007）表示，香港的海归受访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关于回归行为的负面情绪。同样，在研究了接受西方教育的台湾籍和斯里兰卡籍的海归后，Pritchard（2011）并未在被试身上发现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回归创伤，而是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认知失调。因此，学者们对 W 型模型的结论并非一致。

3. 反向文化震荡的心理与行为效应

3.1 海归群体面临的心理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群体，比如企业外派员工、少数族裔的移民、留学生群

体等，在自身的文化认同体系中整合两种或者更多的文化元素(Arnett, 2002)，进而引发多元文化经历所导致的心理与行为后果（胡晓檬，韩雨芳，喻丰，＆彭凯平，2020）。对于海归群体而言，他们短期或者长期旅居海外，同样也会经历多元文化的冲击，形成一种复杂的多元文化认同模式。Susmman 在 1986 年提出，海归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五种：个体对于回归困难的无准备；在个体不知道的情况下，个体内部由于海外经历而产生了变化；家乡文化发生了变化而个体没有意识到，或是认为家乡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没有；朋友、家人和同事希望返回者表现出“正常”或出国前的行为，而不希望返回者表现出新的不同的行为；同事和朋友对海外经历缺乏浓厚的兴趣。这些常常是海归群体失望和沮丧的来源。个体从东道国回到家乡，不仅是地理迁移，也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告别与重建，更是重新认识和适应家乡文化的过程，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挑战。有学者认为，从国外返回时经历的困难可能比移居国外的阶段更有挑战性(Adler, 1981)。Uehara(1986)将疏离、冷漠、失落、迷茫和孤独的感觉列为了可能的心理挑战，而这些心理后果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达到临床疾病水平 (Sahin, 1990)。Raschio (1987)在访谈中发现，一些人经历了非常轻微的情绪失调，而另一些人则一直在与孤立、疏远和绝望的感觉做斗争。Butcher(2002)认为再适应是一个悲伤的过程，这种悲伤是对于归属感的渴望，它可以是文化上的，也可以是具体的。许多学生回国后在访谈中谈到了被剥夺感和心理紧张(Allison, Davis-Berman, & Berman, 2012)。Kartoshkina(2015)发现，被访者在描述回归的负面感受时报告了“丧失感”，这种丧失感主要是由于告别国外生活和伙伴造成的。最近的一项追踪调查发现，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回归后的第一个月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在第 4 个月时，心理健康水平会达到最低谷(Dykhouse & Bikos, 2019)。因此，再适应不良会给海归带来相当程度的的心理困扰。

社会适应方面，海归们同样面临挑战。有被试报告出国经历让他们对母国(美国)文化产生了批判的看法(Kartoshkina, 2015; Dettweiler et al., 2015). Wielkiewicz 和 Turkowski(2010)发现，在国外学习的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当他们获得了不同于本国的新的价值观和信仰时，可能会产生焦虑感和压力感。在参与了为期 6 个月的格陵兰岛探险项目后，英国学生们普遍经历了无法与身边的人交流、感到无人理解、无法模仿他人行为或融入回家后的环境，以及思念旅程中和朋友游历的过程。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经历极为独特，以至于无法与没有相似体验的人进行交流，并且认为没有人对自己的经历感兴趣(Allison, Davis-Berman, & Berman, 2012)。类似的，由于家人和朋友没有出国的经历，他们无法理解海归讲述的故事，沟通困难就产生了。相比起父母，与朋友的沟通似乎更加困难(Kartoshkina, 2015)。另一方面，关系的维持也是海归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有的海归发现家庭紧张是回归后的常态，由于自身世界观与父母的世界观存在较大分歧，在留学期间获得的独立性和孝顺父母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家庭紧张和个人压力的原因。海归与没有海外经历的朋友的友谊也更加难以维持(Turner, Barling, Epitropaki, Butcher, & Milner, 2002)。在对中国海归青年教师的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海归不仅面临着一般性的适应问题，

同时也面临着对于缺乏支持性的组织文化、缺乏知识共享的氛围、低工资、繁重的工作量和组织文化的适应问题(Li, Croucher, & Wang, 2020)。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回归时似乎都会面临社会文化层面的心理挑战，例如孝顺父母、缺乏组织支持等。不过，这些文化不适是东方文化特有的挑战还是所有文化共享的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

3.2 反向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3.2.1 人口学变量

性别在个体的再适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早期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比男性更经常报告家庭和日常生活问题，更倾向于注意社会环境的变化(Brabant, Palmer, & Gramling, 1990)。相比男性，女性留学生处理焦虑的能力更弱，感到更加忧郁和难以放松，并且在与重要他人交往时感到紧张(Wielkiewicz & Turkowski, 2010)。但是研究也有不同的声音：研究者发现女性比男性报告了更高的回归满意度(Rohrlich & Martin, 1991)。也有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在再适应问题上面临的问题、对问题的看法和采取的策略都是相同的(Cox, 2004; Dettweiler et al., 2015; Sussman, 2001)。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平衡被试的性别比例，并且选取了同质性较强的样本，这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年龄因素会影响反向文化适应。海归的年龄越大，经历的适应痛苦越小。年龄不仅与社会适应有关，也与回国后的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Cox,2004; Kartoshkina, 2015)。但是 Uehara(1986)认为年龄与再适应没有显著相关。另外，婚姻状况也是值得考虑的影响因素之一。Cox(2004)发现，海归群体中单身者比已婚者报告了更多的抑郁情绪和更少的家庭文化认同，也就是说单身者回到家乡后产生了更多的文化不适应。

3.2.2 海外经历

个体在出国期间的经历会对其回国后的再适应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是个体与外国文化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个体对留学生涯的总体评价等等。留学时间是个体再适应困难的重要预测变量。Wielkiewicz 和 Turkowski(2010)在对 669 名回国留学生的调查中发现，留学三周及以下的人在反向文化震荡量表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在国外学习一个学期或更长时间的人。说明再适应问题与在客国逗留的时间呈正相关(Kranz & Goedderz, 2020)。留学生对于自身留学经历的积极或消极评价与再适应困难有强相关，同时对留学经历的积极评价与适应困难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距离的调节(Gray & Savicki, 2015)。

Cox(2004)在对 101 名去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后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个体在国外时与家人沟通的频率和满意度会影响回国后的适应情况。个体在国外期间，与家人沟通满意度和抑郁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与家人联系越频繁，回国后的适应会越轻松。但朋友关系与再适应则不显著相关。沟通时使用的媒介对适应也有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抑郁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相似的，留学生在国外期间与客国人民的交流更频繁时，回国后面临的

适应困难可能越大(Rohrlich & Martin, 1991)。回国后的社会支持也同样重要：台湾和斯里兰卡的留学生在访谈中表示由于回归后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理解，因此适应过程非常顺利(Pritchard, 2011)。

3.2.3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影响再适应的重要方面，它可以分为对客国的认同和对母国的认同。根据对两者不同的认同程度，Sussman (2000) 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维度模型。一个人对自身文化认同改变的意识，可能是经历这些变化的个人痛苦的来源，那些报告在国外期间与母国联系减弱，或是与客国关联增强，产生身份转换的人在回归时会经历更多的不适应，反之与母国联系增强，增强了跨文化世界观的个体则会更少的经历不适应。随后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模型：对 44 名回归美国的经理的分析表明，对客国文化认同最多、心理准备最少的人在回国后经历了最多的心理苦恼，偏爱本国文化的海归比融入客国的海归遭遇的心理困难更少。由于海外经历导致的更普遍的自我认同的变化也与个体的心理困扰水平显著相关(Sussman, 2001)。Cox(2004)提出了四种跨文化认同形成的模式：偏爱母国、偏爱客国、整合和分解，在实证研究中，被归类为整合和偏爱本国的回归过程比被归类为分解和偏爱客国的回归过程更容易重新适应，表现为整合组和偏爱本国组的抑郁得分较另外两组更低社会困难得分也较低。研究者认为最健康的模式是海归在保持与本土文化联系的同时熟练掌握客国文化。Kranz 和 Goedderz(2020)参照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模型，研究了再适应问题与母国文化承诺的关系，结果显示在以变量为中心的水平上，回归问题与对母国文化的承诺呈负相关，与探索呈正相关，与反思的相关程度最高。处于暂停状态(低承诺、高探索、高反思)的被试呈现出现了最多的再适应问题 ，而处于关闭状态(与暂停相反的模式)的被试面临的再适应问题最少。最近的一项追踪调查中显示，主观报告的对客国的社会文化适应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速度和随后回到基线的速度的重要预测因素。尽管大多数海归在回国 4 个月后心理健康水平达到最低，12 个月后回到基线，但是更适应客国文化的人在回国后经历了更多的心理困难，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回到基线(Dykhouse & Bikos, 2019)。

3.3 反向文化震荡的双刃剑效应

3.3.1 消极效应

1989 年，Seiter 和 Waddell 发现反向文化震荡与一般人际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经历高度的反向文化冲击时，建立认同感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很低，良好应对日常社会生活压力的可能性也很低(Presbitero, 2016)。Gaw(2000)对美国留学生的重返经历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经历高反向文化冲击的学生比低反向文化冲击的学生更容易报告个人适应问题，其中包括疏远、无归属感、孤独、难以交朋友、自卑感、抑郁和一般性焦虑和害羞问题(包括社交害羞和演讲焦虑)。报告更高适应困难的美国留学生

会有更多的消极情绪，表明适应困难的留学生可能会有一个情感上重新追寻与母国文化依恋的过程(Gray & Savicki, 2015)。一项对日本海归的研究发现，那些适应不良的人感受到了更多的不被社会接纳的感觉，适应良好的个体在开放问题中提到了更多接纳自己的人(Yoshida et al., 2009)。Presbitero(2016)考察了文化震荡和反向文化震荡对个体适应的影响，发现被试的反向文化震荡得分与心理和社会适应都有显著负相关。但是，文化智力，即人们在与不同文化打交道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高中华 & 李超平, 2009））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减轻反向文化震荡对个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

3.3.2 积极效应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反向文化震荡对个体并非仅有消极的影响，这提示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现象。研究发现，反向文化震荡，或者文化再适应可以成为提高个体对母国文化认知和自我意识的途径。留学生通过出国的经历和回归再适应的过程加深了对自身以及本国文化的理解(Uehara, 1986)。同时，旅居者从国外返回时，通过与家人和朋友的接触得到抚慰，从而变得更加感恩(Kartoshkina, 2015)。文化适应和再适应的经历也会使得海归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事物，辩证地看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在生活中，他们也能采取积极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Kartoshkina, 2015; Li et al., 2020)。留学经历带给人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视野、增加人生阅历、扩大人生格局、提高思辨能力、积累社会资本等等。

3.4 如何减少反向文化震荡

第一阶段，在行前准备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心理准备充分可以降低回国后面临的再适应困难(Susaman,2001)。因此，对有回国意图的海归进行回国前培训非常必要。精心设计的出国前和回国后的计划有助于学生发展适应技能和跨文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居者出国教育的成败(Thebodo & Marx, 2005)，对于尚未出国的留学生来说，开展行前培训不仅有利于减少文化震荡的冲击，也有利于减少反向文化震荡的冲击。第二阶段，在国外留学期间，个体应当更多使用现代科技与母国加强联结，时刻关注母国发生的变化，形成对家乡的客观认知和现实期待；也应当更多地实时分享自己的经历，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相互了解。个体还应积极探索如何将母国和客国的经历融会贯通，产生新的火花和思想共鸣。第三阶段，在回国之后，个体应当正确认识自身和母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以客观开放的态度接受当前存在的问题，给自己一段适应期和过渡期。同时也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和解决问题，例如主动解决矛盾、维护人际关系、寻找分享经历的机遇、参加再适应课程等等。此外，个体还应将在国外生活时的探险热情应用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探索新的人生进程上，以期获得个人的终身成长。

4.局限与未来展望

以往文献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首先，反向文化震荡的衡量标准不一致。测量工具的不一致导致研究者无法明确研究结论、比较研究结果、得出聚合证据、提炼理论模型；其次，研究对象的身份各不相同，不仅有留学生、公司外派员工，更有回归的移民及其后代等，这导致了研究当中得出了分化的结论；再次，量化研究中缺乏实验证据，难以做出因果推论和干预研究；最后，如何将海归研究本土化是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国内外心理学领域对于海归群体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多数属于描述性的研究，缺乏理论剖析和实证积累。展望未来，仍有许多开放性的研究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界定和测量反向文化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如何影响海归的再适应过程，互联网革命在海归经历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新冠疫情背景之下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何影响海归的再适应过程，如何挖掘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来应对反向文化震荡，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如何提供组织文化层面的指导和支持来帮助海归群体提升反向文化适应，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高中华, & 李超平. (2009). 文化智力研究评述与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17(01), 180-188.

胡晓檬，韩雨芳，喻丰，彭凯平. (2020). 多元文化经历的双刃剑效应：心理后果与边界条件. 应用心理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12,14)教育部 2019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Adler, N. J. (1981). Re-entry: Manag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Group & Organization Studies*, 6(3), 341-356.

Alkhalaf, K. (2019). Reverse acculturative stress among saudi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audi arabia (Order No. 13902224).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2292188719).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issertations-theses/reverse-acculturative-stress-among-saudi-students/docview/2292188719/se-2?accountid=14426

Allison, P., Davis-Berman, J., & Berman, D. (2012). Changes in latitude, changes in attitud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everse culture shock–a study of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youth expeditions. *Leisure Studies*, 31(4), 487-503.

Arnett, J. J. (2002). The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10), 774.

Berry, J. W. (1990).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 general framework. In W. H. Holtzman & T. H. Bornemann (Eds.), 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p. 90–102). Hogg Foundation for Mental Health.

Black, J., Gregersen, H. & Mendenhall, M. (1992).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patriation Adju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3, 737–760.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jibs.8490286

Bourhis, Richard Y., Lena Celine Moise, Stephane Perreault & Sacha Senecal (1997).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2:6, 369-386, DOI: 10.1080/002075997400629

Brabant, S., Palmer, C. E., & Gramling, R. (1990). Returning h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ross-cultural ree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4(4), 387-404.

Butcher, A. (2002). A grief observed: Grief experiences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4), 354-368.

Chiang, L. (2011). Return Migration: The Case of the 1.5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in Canada and New Zealand. *China Review*, 11(2), 91-123.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1,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3462346

Cox, J. B. (2004).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repatriation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8(3-4), 201-219.

Dettweiler, U., Ünlü, A., Lauterbach, G., Legl, A., Simon, P., & Kugelmann, C. (2015). Alien at home: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a six-months over-sea's educational progr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4, 72-87.

Dykhouse, E. C., & Bikos, L. H. (2019). Re-entry friction: The curious effects of cultural dislocation on outcomes for global service learning return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72, 96-108.04

Furukawa, Toshiaki M.D., PH.D.1 Sojourner Readjustment: Mental Health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One Year's Foreign Sojourn and its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April 1997 - Volume 185 - Issue 4 - p 263-268

Gaw, K. F. (2000). Reverse culture shock in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1), 83-104.

Gray, K. M., & Savicki, V. (2015). Study Abroad Reentry: Behavior, Affect, and Cultural Distance.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26, 264-278.

Gullahorn, J.T. and Gullahorn, J.E. (1963), An Extension of the U-Curve Hypothesis1.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 33-47.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63.tb00447.x

Howard, C. G. (1974). The returning overseas executive: Cultural shock in rever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e-1986), 13(2), 22.

Kartoshkina, Y. (2015). Bitter-sweet reentry after study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4, 35-45.

Kranz, D., & Goedderz, A. (2020). Coming home from a stay abroad: Associations between young people's reentry problems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74, 115-126.

LaFramboise, T.D. , Coleman, H.L.K. and Gerton, J. (1993)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Biculturalism: 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 395-412.

Li, M., Croucher, S., & Wang, M. (2020). Re-entry cultural adaptation of foreign-educated academics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Lysgaard, Sverre (1955). "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7: 45-51.

Navas, Marisol, María C. García, Juan Sánchez, Antonio J. Rojas, Pablo Pumares, Juan S. Fernández (2005). 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 Model (RAEM): New contribu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ume 29, Issue 1, Pages 21-37, ISSN 0147-1767,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05.04.001.

Piontkowski, U., & Florack, A. (1995). Attitudes toward acculturation from the dominant group's point of view. Paper presented to IV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 Athens.

Presbitero, A. (2016). Culture shock and reverse culture shock: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53, 28-38.

Raschio, R. A. (1987).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reverse culture shock and reentry adjustment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Redfield,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 (1936).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1), new series, 149-152. Retrieved January 13, 2021,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662563

Rohrlich, B. F., & Martin, J. N. (1991). Host country and reentry adjustment of student sojou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5(2), 163-182

Şahin, N. H. (1990). Re-entry and the academic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2(2), 165-182.

Seiter, J. S., & Waddell, D. (1989). The Intercultural Reentry Process: Reentry Shock, Locus of Control, Satisfaction, and Interpersonal Uses of Communication.

Steyn, Melissa E. & Grant T. (2007). "A real bag of mixed emotions": Re-entry experiences of South African exi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1(3), 363-389.

Sussman, Nan. (2007). Identity shifts as a consequence of crossing cultures: Hong Kong Chinese migrants return home. 10.1163/ej.9789004151697.i-404.46.

Sussman, N. M. (1986). Re-entry research and training: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2), 235-254.

Sussman, N. M. (2000). The dynamic natur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out cultural transitions: Why home is not so swee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4), 355-373.

Sussman, N. M. (2001). Repatriation transitions: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cultural identity, and attributions among American manag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5(2), 109-123.

Thebodo, S. W., & Marx, L. E. (2005). Predeparture orientation and reentry programming. *NAFSA's guide to education abroad for advisors and administrators*, 293-312.

Uehara, A. (1986). The nature of American student reentry adjustment and perceptions of the sojour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4), 415-438.

Wang, L. (2016) The Benefits of in-betweenness: return migration of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o Chi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12, 1941-1958, DOI: 10.1080/1369183X.2016.1139447

Wielkiewicz, R. M., & Turkowski, L. W. (2010). Reentry issues upon returning from study abroad program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51(6), 649-664.

Yoshida, T., Matsumoto, D., Akashi, S., Akiyama, T., Furuiye, A., Ishii, C., & Moriyoshi, N. (2009). Contrasting experiences in Japanese returnee adjustment: Those who adjust easily and those who do no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3(4), 265-276.

From “Studying Abroad Fever” to “Returning Home Wa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f Returnee’s Reverse Culture Shock

Sihua Liao[1] Erjia Xu[1] Fengyi Ding[2] Ping Hu[1] Xiaomeng Hu[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Returnees usually face problems of re-adaptation when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country after living abroad for a period of tim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issues is the reverse culture shock. This latter may have severe consequential impacts on returnee’s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stres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ur current work sorts out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the reverse cultural shock,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ts underlying mental processes.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work would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empirical support to better inform the govern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garding policy making.

Keywords: Returnees, Reverse culture shock, Accultu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oping strategies